

专题



何秉彝烈士及《上大五卅特刊》



◀ （上接 9 版）

识、分析中国问题,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,奠定了重要基础。社会学系的这些名师,不仅影响了校内青年学子,还通过讲义的发行影响了校外。李维汉就曾在《怀念秋白》中写到自己于1924年在湖南读到瞿秋白等编的《社会科学讲义》,并用它来讲课,“学生们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,我也从中得到不少教义”。

“武有黄埔,文有上大”

除了社会学系,上大广揽贤才,打造了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。中国文学系有陈望道、邵力子、谢六逸、沈雁冰、田汉、俞平伯、郑振铎等;英国文学系有何世桢、董承道、冯子恭、孙邦藻;美术科有洪野;中学部由教育家侯绍裘主持。教材基本都是教师自编的,如陈望道讲授的是修辞学、国文法,开明书店后来出版的《修辞学发凡》就是他当初的讲稿。当时大部分老师都为兼职授课,一些年纪轻的在讲堂上还颇有些“不自在”,施蛰存就曾回忆说:“田汉那时上课都不敢看下面的学生,只顾盯着天花板,我们都不禁失声笑了。”

“大牌”师资云集,使得原本东南高师的烂摊子在短短2年时间内闻名遐迩,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“武有黄埔,文有上大”的说法。

在上海大学创办伊始,瞿秋白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表下决心,“要用些精神,负起责任”,把上大建设成为“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”。刘长林说,从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在学校的广泛传播,可以看出此时的上海大学已经成了新文化运动强大的宣传阵地。他的证据有三:一是中共刊物在上海大学的自由流通,“青年团成员在上海大学以学生自治的名义组织了书报流通处,公开销售《向导》《新青年》等”;二是上海大学所用教

材,有不少采编自陈独秀的文章;三是中共教师在讲述社会主义、国民革命、帝国主义等内容时,都会用褒扬的态度提到陈独秀。“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、后期,前期大家熟知的是解放思想,提倡民主与科学,而后期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。”刘长林认为,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,也使得上海大学成为后期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镇。

共产党活动的中心

除了系统、细致的理论学习和宣传,上大的热血青年们在有着革命斗争经验的教师的熏陶和激发下,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,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中去。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大学结出的硕果。作为革命的熔炉,上大在1924年底就被《大陆报》拿来作比,同北京大学并称为“共产党活动的两大中心”。

上大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,当时在上海算是比较强的。有资料显示,1924年1月,上海党员50人,上大就有18人。1926年,党组织上大特别支部成立,党员61人,同年底增至130人,是全市党员最多的支部。至于青年团,1924年10月,上大团员数量几乎占上海团员的一半(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《1921—1933:中共中央在上海》)。

上大社会学系党团员最多,参加革命活动最为活跃,他们注重为社会服务、为大众服务,开展了各种群众性、政治性的活动,比如深入工人居住区和街道办平民学校、工人夜校、识字班,服务对象有工友、妇女、儿童,年龄最小的才八九岁。

在这过程中,上大学生李硕勋、刘华、杨之华等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、工人运动、妇女运动的领导人,而英勇牺牲的黄仁、何秉彝则用满腔热血谱写了感人篇章,被永载史册。

1924年10月10日,上海各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的国民大会,不少上大学生赴会。国民党右派指使流氓诬陷学生扰乱会场秩序,对学生大打出手。上大社会学系学生黄仁被推下讲台,不幸身亡。轰动一时的“黄仁事件”也成为上大学生献身革命的首次尝试。何秉彝随后还在《向导》上发表《哭黄仁烈士》的长诗,表示要“尽我这残生,继你的素志,为革命而战”。

1925年5月30日,上海工人、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,进行反帝宣传,揭露日本人枪杀工人顾正红、逮捕学生的罪行。何秉彝作为示威宣传的联络员,奔走于各条马路。下午,南京路老闸捕房的巡捕公然朝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,打死13人,逮捕了150多人,是为震惊中外的“五卅惨案”。年仅23岁的何秉彝当场被击中,翌日因抢救无效死亡。后据《上大五卅特刊》记载,仅在“五卅惨案”当天,上大受伤的学生就有13人,被关押的达131人(《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》)。

作为五卅运动先锋队的上大,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前沿,社会上也开始流传“北有

五四的北大,南有五卅的上大”的说法。

以“养成建国之人才”为宗旨的上海大学,先后为国共双方输送了很多革命骨干。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是秘密进行的,孙中山在国民党“一大”开幕词中就明确表示:“惟当时各省多在军阀铁蹄之下,不易公开招生,故预先委托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。”因此参会的国共双方代表就成为黄埔一期生的招生代理人,毛泽东就在上海大学负责过一期生的复试。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于右任可谓黄埔军校初创时的第一招生大户,共介绍了76名学员,这虽然跟其个人魅力、社会地位有关,但上海大学校长的身份也帮了不少忙,不少上大学生后来也都考取了黄埔军校(陈予欢《黄埔军校》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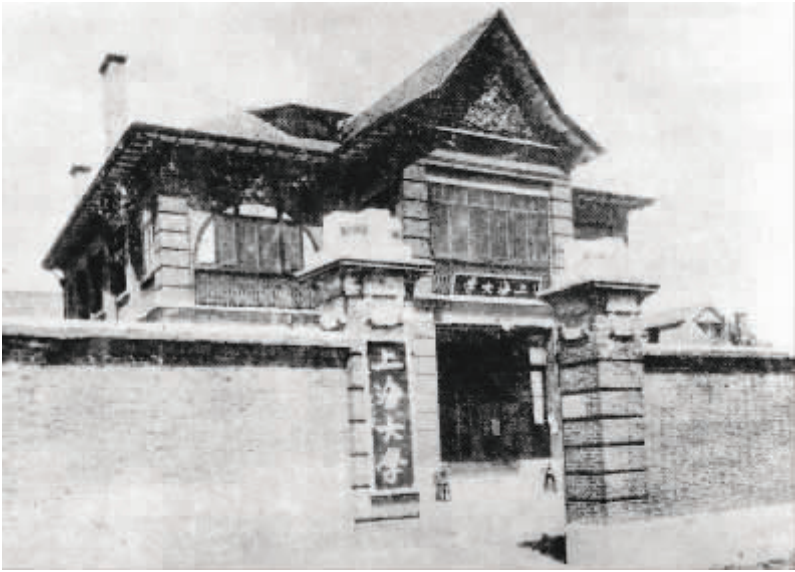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北伐前后,上海大学实质上已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全方位人才的大学,涌现了一批职业革命家、理论家和文学、史学大家,包括王稼祥、秦邦宪(博古)、杨尚昆、阳翰笙、何挺颖、郭伯和、施蛰存、戴望舒、孔另境、谭其骧、匡亚明、丁玲等,都在“上大”学习并

走出了一条各自发展道路。正如邓中夏所说:“上大学系虽杂,而各欲以所学从各方面企图建国的目的完成则一,只此一片耿耿孤忠,是我们大多数教职员和学生所不能一日忘的,所努力从事的,这便是和别的大学不同的地方,也便是上大的使命。”

传承与弘扬红色基因

1922年上大创办时条件极其简陋、艰苦,校舍就是青云里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楼房,两层楼共10间房子。1924年2月,“弄堂大学”的学生数增至400人,学校迁到公共租界的西摩路(今陕西北路南阳路口)132号,同时借用了时应里、甄庆里、敦裕里民房为师生宿舍。1925年6月,英军对上海大学实行武装占领,学校在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临时办事处,租下方斜路新东安里18号为临时校舍。7月中旬,租用中兴路德润坊(今公

（下转 11 版）▶



1924年2月,上海大学学生数增至400人,学校迁到公共租界的西摩路132号。



1924年2月—1925年5月,上海大学借用了时应里部分民房作为师生宿舍。



1925年8月上旬,上海大学搬到青云路师寿坊,弄堂口还挂上了于右任写的牌子。